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江戶寫本研究

李紀祥*

I. 前言

II. 管志道《大學》著作與改本研究的意義

III. 《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江戶寫本之篇目與底本考辨

IV. 結 論

■ 摘要

明萬曆朝管志道受王陽明刊刻《古本大學》、豐坊製作《魏石經大學》影響，亦撰有《大學》改本。其書傳世不廣，故近代研究者亦少。本文則據現今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所藏《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之江戶寫本，作出目錄學與學術史的深入探討，兼及寫本思想特色與篇章問題，以為敘錄。

關鍵詞：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江戶寫本、王陽明古本《大學》、豐坊《魏石經大學》。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班教授
e-mail: mynamechlee@gmail.com

■ Abstract

**A study on the Edo manuscript of the
Re-edited version of Daxue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Documentary Archives
of Japan**

Lee Chihsi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wan)

In the Ming Dynasty, Guan Zhidao(1536-1608) was influenced by Wang Yangming(1472-1529)'s publication of the *Ancient version of Great learning*, and Fengfang(1492-1563)'s *Stone engraving Daxue of Wei dynasty*. He also re-edited another vers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 Since this work has not been widely circulated, there is almost no recent research on Guan's book.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Edo manuscript of the *Re-edited version of Daxue* currently stored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in Tokyo, Japan. The author will make an in-depth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bliography and the approach of academic history, as well as analyze the issues of recording chapters in the manuscrip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content.

Keywords: Guan Zhidao, *Re-edited version of Great Learning*, Edo manuscripts, Wang Yangming's *Ancient version of Greatlearning*, Feng Fang's *Stone engraving Daxue of Wei dynasty*

I. 前言

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江蘇太倉人，生於嘉靖15年(1536)，隆慶五年(1571)二甲進士，歷官南京兵部主事、刑部貴州主事、員外郎 廣東按察僉事，萬曆36年(1608)逝世，享年七十三。

錢謙益(1582-1664)對管志道自稱「門人」，「執弟子禮」¹⁾，撰有《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晉階朝列大夫管公行狀》，稱其學「少篤信好學，精研五經性理，確然以聖賢為己任。壯而從耿恭簡遊，與聞姚江良知之旨。」²⁾又稱「本儒宗以課業，資禪理以治心。」³⁾黃宗羲《明儒學案》則將管氏編入《泰州學案》，作小傳，云「受業於耿天臺，著述數十萬言，大抵鳩合儒釋，浩瀚而不可方物。」⁴⁾又云「泰州張皇見龍，東溟闢之，然決儒釋之波瀾，終是其派下人也。」⁵⁾兩人對管志道的評價差異頗大。

管志道的思想豐富，學界在過去早有研究，迄今積累已有不少成果；但是對管志道在《大學》領域著作的研究，則尚乏人間津，近代學界探討者實甚尠。管志道出身泰州王門，其對王陽明刊行《古本大學》以批判朱子列為官學的《大學章句》，必定甚為熟稔；王門後學多半受此影響，或追隨陽明提倡《古本大學》提出《大學》思想新論述；或者另外重新訂定章句，以製作《大學》改本，此在明嘉靖、萬曆年間蔚為風潮。管氏生

1) 錢謙益撰、錢曾箋注、錢仲聯點校，《牧齋初學集》，卷49，〈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晉階朝列大夫管公行狀〉，冊中，頁126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三冊，1985年。

2) 錢謙益撰、錢曾箋注、錢仲聯點校，《牧齋初學集》，卷49，〈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晉階朝列大夫管公行狀〉，冊中，頁1258。

3) 錢謙益撰、錢曾箋注、錢仲聯點校，《牧齋初學集》，卷49，〈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晉階朝列大夫管公行狀〉，冊中，頁1257。

4)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32，泰州學案一，冊下，頁708，台北：里仁書局，《黃宗羲全集》，點校本，1987年。

5)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32，泰州學案一，冊下，頁708。

前即撰有《大學》著作多種刊行，晚明及清人書目中尚有著錄，惟因後世流傳故，未被學者留意。本文以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的江戶寫本《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為據，深入探討管氏在《大學》方面的著作與改本特色，並將此江戶寫本與前人著錄及晚近發現的明刊本作出對照，期能從明代中葉以後的《大學》改本史角度，對此江戶寫本作出深入探究，並就正於方家。

II. 管志道《大學》著作與改本研究的意義

過去學界對管志道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王門學思與儒釋融合上，對其重訂《大學》改本，則未曾得到關注，這也與他的《重訂大學古本章句合釋文》傳世侷限有關。必須等到1988年《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一書在台北出版問世，才首次出現學界對管志道《大學》改本的研究專章。該書所運用的文獻，乃是過去未被學界發現並關注的東瀛藏本，復從「改本史」角度，將管志道《大學》改本的詳情，以及其與明代正德朝王陽明(1472-1529)《古本大學》刊本、嘉靖朝豐坊(1492-1563)《魏石經大學》改本間的脈絡關係，作出了研究。⁶⁾ 該書當年研究所運用的東瀛資料，即是現

6) 見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本書對管志道《大學》改本的研究，係置於第五章第四節，頁201-211，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在本書問世之前的明人劉斯原《大學古今本通考》(明萬曆間刊本，12卷，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基金會印行，1976年)、清人毛奇齡《大學證文》(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九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76年)、清人謝濟世《大學校議》(不分卷，朱絲欄鈔本，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本)、近代程元敏《大學改本述評》(台北：孔孟學報第23期，頁135-168，1972年)、王大千《改本大學釋義》(台北：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魯實先教授指導，1974年)、傅武光《四書學考》(台北：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18號，頁651-928，1974年)、林慶彰《豐坊與姚士粦》(台北：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

藏於東京國立公文書館的江戶寫本《重訂大學古本章句合釋文》，由此本管氏自序年代看來，可知寫本所據底本，應是源出於中土的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且由題名可知，管志道重訂《大學》係以「古本」稱之，知其實受陽明刊刻《古本大學》之影響。自明代正德、嘉靖、隆慶、萬曆以來，明儒受王陽明影響，對漢代戴聖所編《禮記》本《大學》，多以「古本」、「舊本」視之，稱為《古本大學》或「《大學》古本」；此詞所相對者，乃是有明當代稱為「今本」、「新本」的朱子《大學章句》，其實亦是一種《大學》改本。《明史·選舉志》記載明成祖永樂時頒佈《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之影響，云：

永樂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註疏不用，其後《春秋》亦不用張治《傳》，《禮記》只用陳澹《集說》。⁷⁾

《禮記大全》全以陳澹(1260-1341)《禮記集說》為底本，不載《大學》、《中庸》二篇本文，但留篇目，如《大學》篇即云：「大學第四十二。朱子章句。」⁸⁾故知明代《禮記大全》削去《大學》本文，標注「朱子章句」，便是官方對科舉典範版本之宣告。有明學子但知《大學章句》與《大學章句大全》，在科舉影響下，對《禮記·大學》實已陌生，此點亦充分解釋了王陽明為何要單獨刊行《禮記·大學》篇，並將其題為《古本大學》之背景。劉斯原編纂明代第一部《大學》改訂本文獻，便以《大學古今本通考》為書名，題名中的「古今本」蘊藏了古、今的時間性意含，「古本」指向王陽明正德十三年(1518)時在南贛首刊的《古本大學》，《王陽明年譜》於此年載錄云：

碩士論文，屈萬里教授指導，1978年)等學位論文，均因資料在東瀛罕見故，而未能論及並納入研究。

7) 張廷玉等，《明史》，卷70，選舉志二，頁2，仁壽本廿六史，據東海徐氏退耕堂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1年。

8) 胡廣等，《禮記大全》，卷29，冊8，頁19下，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六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76年。

七月，刻古本《大學》。

刻《朱子晚年定論》。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⁹⁾

《年譜》又云：

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至是錄刻成書，傍為之釋，而引為敘。¹⁰⁾

《年譜》既云「刻古本大學」，又謂「錄刻傍釋」，可見當時南贛所刻之《古本大學》，係一刻有傍釋小注的版本。原本今雖不可見，然根據王文祿(1532-1605)刊於隆慶二年(1568)《丘陵學山》叢書標為「天號」的陽明《大學古本》，即刻有「傍釋」小字注，此本雖題《大學古本》，然板心則皆題「大學古本傍釋」，很可能此本便是現存「知見」最早的一個版本。王文祿自云：

海鹽後學王文祿曰：嘉靖丁亥秋，先康毅君率祿渡江扣陽明洞，聞王龍溪先生講大學，得古本傍釋，止前序，後增四問答，祿今重梓，增答格物問，標眉若壓經，敢移附傍經文。¹¹⁾

9) 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33，年譜一，冊下，頁1253、1254、1255。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二冊。

10) 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33，年譜一，冊下，頁1254。

11) 王文祿，《大學古本問·後語》，頁9上-下。收在明王完編，《丘陵學山》，天號，隆慶二年刊85卷本，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本。又見王完編，《百陵學山》，天號，明隆慶二年刊、萬曆12年重刊119卷本，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又見，顧廷龍等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冊159，《大學古本問》，頁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按此本據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題「明萬曆刻百陵學山本」，當即是119卷本，與台北故宮藏本同。

丁亥秋即嘉靖六年(1527)時，王文祿自云親聞王龍溪(1498-1583)講《大學》，又得「古本傍釋」，故王文祿所刊《丘陵學山》本之《大學古本》，其源頭即來自陽明南贛初刻本。是故，陽明正德南贛首刊之《古本大學》，應當就是含有「傍釋」的本子，只是初刻本之名，究為《古本大學》還是《大學古本》又或者為《大學古本傍釋》，今雖以《年譜》所載為據，然仍有莫可考知處；但正德南贛初刻本中有「傍釋小字」，則應可確定。同時王文祿所重梓的隆慶二年《丘陵學山》本，也作了一些更動，並非王龍溪所傳正德南贛初刻本原貌。

要之，陽明首次刊刻單行本《大學》而稱「古本」，他的「古本」一詞，指向漢代的《禮記》本《大學》，在時間性上已是相對於明代的「今」而謂之「古」。這也反映，在陽明之後，將《禮記》本《大學》稱為「古本大學」是一個普遍的流行稱呼。故其門人聶豹(1487-1563)《重刻大學古本序》云：「陽明逝矣，其有功於聖學，古本之復其一也。」¹²⁾

另外，陽明所採係提倡恢復古本以反對朱子今本學說，並未訂正《大學》以成新本；明代通過「改本模式」以批評朱熹《大學章句》官學定本，實以豐坊製作偽造《魏石經大學》最具影響。豐坊之製作其實是出於假名原典的「魏本」，而其內裏真相則為一種「偽石經本」《大學》改本製作。因此，此東瀛寫本所見管志道著作題名，一方面稱「古本大學」，一方面則稱「重訂大學」，前者實受陽明影響，後者則明顯受豐坊影響。錢謙益即云：

公表彰石經《大學》為劉歆、賈逵所傳者，出於鄭端簡之《古言》；而門人瞿太僕汝稷著書力辯其偽，綏安謝兆申作《石經考證》，尤為詳覈。或曰：嘉靖中四明豐坊偽譌也。¹³⁾

12) 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卷41，附錄序跋，冊下，頁1598。

13) 錢謙益撰、錢曾箋注、錢仲聯點校，《牧齋初學集》，卷49，〈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晉

不同的是，豐坊的訂正《大學》與製作改本，宣稱的「原本」意識乃是提出「魏石經」的名號，而管志道的「改本」意識則是宣稱《古本大學》原典之還原重訂。管志道於《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之末，云：

按太學一篇，宋朱文公熹全動鄭氏古本，而以經傳分章句。國朝王文成公守仁則不宗朱子章句，而宗鄭氏古本。近儒又或兩推敲於其間。¹⁴⁾

又曰：

亦深重王子之講格物致知，暗合達本格致兩目，貫通誠正修齊治平八目之義。¹⁵⁾

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管志道其書題名既曰「重訂」，復又云「古本」，則顯是受到陽明「古本」刊行之影響。文中所稱「達本」，係指賈達所傳於曹魏的石經本。國立公文書館江戶寫本附錄《辨石經大學錯簡》云：「魏石經賈達傳出秘府太學」¹⁶⁾，又寫本《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釋「大學」標題：「大，音泰。」¹⁷⁾此寫本之附錄《古本大學辨義》，抄寫者皆抄題為「太學」，可見管志道係將「大學」一詞解讀為「學校、學宮」義，從鄭玄所釋，與朱子「大人之學」釋義不同，管志道云：「愚考戴記古本，原讀太學。」¹⁸⁾

階朝列大夫管公行狀》，冊中，頁1267。

14) 此據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卷下，管志道跋語，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原內閣文庫本，江戶寫本，寫本前附管志道萬曆34年序，故知據萬曆34年刊本寫錄。案：此寫本無頁碼標示。

15) 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合釋文》，卷下末，管志道跋語，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原內閣文庫本，江戶寫本，原文無頁碼。

16) 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合釋文》，附錄，《辨石經大學錯簡》，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原內閣文庫本，江戶寫本。

17) 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合釋文》，卷上，題注，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原內閣文庫本，江戶寫本。

管志道深受豐坊所傳《魏石經大學》及其造說影響，故推尊豐坊魏石經本稱「逵本」或「賈本」；復又不愜賈逵傳本，以為並非完本，仍有錯簡，故又重訂之。管志道對《古本大學》的重訂，其實便是一種《大學》改本，而且深受豐坊《大學》改本影響，是故近代學界目前提出的一種考察觀點，便是將管志道的《大學》改本，置入明代「豐坊影響史」脈絡中定位。¹⁹⁾

III. 《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 江戶寫本之篇目與底本考辨

管志道《大學》改本因流傳不廣，故鮮為人知，錢謙益《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晉階朝列大夫管公行狀》中載其《大學》相關著作云：

《石經大學測義》三卷，《辯義》二卷，《訂釋》一卷。²⁰⁾

清黃虞稷(1629-1691)《千頃堂書目》則載管志道《大學》之書五種七卷：

管志道，《石經大學章句輯注》一卷，《測義》三卷，《略義》一卷，《古本大學訂釋》一卷，《辨古本大學》一卷。²¹⁾

18) 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合釋文》，卷上，釋文，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原內閣文庫本，江戶寫本。

19) 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論述明代《大學》改本，係將管志道、劉宗周、葛寅亮三家之《大學》修訂，視為同受豐坊影響的改本，故其章節類分，即題名「明代改本：偽石經影響下之改本」，見李氏，前揭書，第五章第四節標題，頁291。

20) 錢謙益撰、錢曾箋注、錢仲聯點校，《牧齋初學集》，卷49，〈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晉階朝列大夫管公行狀〉，冊中，頁1266。

朱彝尊(1629-1709)《經義考》所著錄，則係《大學》六書，共八卷：

《測義》三卷，《輯注》一卷，《略義》一卷，《古本訂釋》一卷，《辨古本》一卷，《石經大學附錄》一卷。²²⁾

管志道《大學》著作刊刻，據寫本所附管志道萬曆丙午年所撰序文可知，應是萬曆34年之刊本，惟諸書前後刊刻單行與彙本的歷程實況，則已莫能考校其詳。錢謙益《管公行狀》撰於崇禎元年，故錢謙益、黃虞稷、朱彝尊等所見錄管志道之《大學》改本，應同源此管志道萬曆丙午年序文刊本，然錢謙益錄為三種六卷，黃虞稷則著錄五種七卷，朱彝尊著錄又為六書八卷，卷數均不相同，其詳是否與流傳再刊有關，覈故未知。清代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已未收管氏此書，《存目》中亦未列書名，可知此時管書流傳已稀。今則台灣之各圖書館公藏書目中，亦未見著錄，及檢日本林泰輔《四書現存書目》，始知此書東瀛藏有抄本。²³⁾日本東京之國立公文書館有「原內閣文庫」藏本，題為「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前附萬曆34年管志道《重訂古本太學章句序》，附錄三種，線裝，首葉、末葉鈐有「內閣文庫」、「日本政府藏書」之印，首葉又有「林氏藏書」印，是否與德川幕府初期儒者「林羅山」或其後代有關，未詳。國立公文書館書目著錄為「江戶寫本」，可知是「萬曆34年刊本」的抄本，由抄本字體筆跡看來，應是江戶時代的日人抄寫，惟抄本係在中國境內抄錄後攜回，或是萬曆原刊本傳入東瀛後在江戶抄寫？則已莫能考知。抄本的抄寫年代不明，雖此本線裝原書鈐有章印，亦不能作為證據判定。如「內閣文庫」之章，雖可

21)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適園叢書本，卷2，冊1，頁1160。台北：廣文書局印行，1967年。

22) 朱彝尊，《經義考》，卷160，頁4-5。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年，二冊。

23) 林泰輔，《四書現存書目》，日本大正三年排印本，前編，頁2。收入嚴靈峰編，《書目類編》，冊99，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

作為明治內閣府成立內閣文庫後的擁有者年代，卻無法作為抄寫年代的時間佐證；同理，「日本政府藏書」章，亦絕非抄寫者抄寫年代的印記。此本題稱「江戶寫本」之最重要依據，只能是因為其典藏所在的來源，出自德川家康幕府初期成立的「紅葉山文庫」。

本文敘錄管志道撰著《大學》改本諸書，主要所據，便是此藏於日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之江戶寫本。李紀祥於《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書中，係將此本題作「內閣文庫藏本」，並未標出「國立公文書館」之名，此其受限當時時空背景，故書目著錄並不周延；而近代學人運用原內閣文庫漢籍藏本者又眾，筆者深覺有必要針對此問題作出目錄學解說。²⁴⁾

日本圖書典藏史的內閣文庫藏書，其主要的歷史來源，便是出自江戶初期德川家康幕府成立的紅葉山文庫；其後東、西洋海上接觸史展開，日本亦在幕府結束後進入近代的明治時期，此一紅葉山文庫也於明治維新後移轉至內閣府，並成立內閣文庫機構以典藏管轄；有關日本幕府於初始便由德川家康設立「紅葉山文庫」始末，其詳可參昭和學者小野則秋所撰《日本文庫史》中「紅葉山文庫」章節，此不贅述。²⁵⁾紅葉山文庫至昭和時期的1971年，日本制定國家圖書館法規並設立國立公文書館，接管內閣文庫之所有藏書，故此時期之藏書仍可稱為「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本」；逮1999年國家訂定《國立公文書館法》，其後又於2001年平

24) 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之研究》，在管志道改本章節正文註釋與參考書目中，皆僅題作「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既忽略了「江戶寫本」的歷史背景與德川幕府「紅葉山文庫藏本」的關聯，同時，也忽略了該書1988年出版時，「內閣文庫」已變更為「國立公文書館」的史實，見氏著，頁377。而晚近刊登於《孔子研究》的向仲敏，《管志道大學改本研究》，也同樣稱其所據底本為「日本內閣文庫漢籍藏書寫本」，電子版，亦是犯了同樣的錯誤。向文見《孔子研究》，2021年第1期，頁118。

25) 小野則秋，《日本文庫史》，第四章第二節部分，頁132-155。京都：教育圖書株式會社，昭和17年10月。本書出版年為西元1942年，雖為較早期著作，且完成於國立公文書館成立之前，但仍為目前研究紅葉山文庫歷史的重要著作。

成時期轉型為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公文書館，自此再無「內閣文庫」此一機構與組織。此後在官方單位的正式公文書上，亦不復再有「內閣文庫」之正式單位名目，僅存圖書版本文書資料來源的「原內閣文庫藏本」之歷史名目而已。²⁶⁾ 這也說明了筆者自身的經驗，筆者在1982年時，從東海大學圖書館提出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影印「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中文抄本」申請時，仍可使用「內閣文庫」一詞；但至2003年筆者親赴東京，向國立公文書館提出調閱「1602年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申請時，該館已無「內閣文庫」單位，只在典藏書目及實際歸類上仍存過往「內閣文庫藏書」的類別，其下並區分為「和書」、「漢書」、「洋書」三種次類別，藉此保留「國立公文書館」之古籍來自內閣文庫移轉的歷史軌跡；一如江戶幕府的紅葉山文庫藏書移轉至明治時期之內閣府，都是曾經的歷史流轉。因此，晚近學者如果使用了「內閣文庫藏本」一詞時，便必須同時標出「國立公文書館」的確切單位新名，或簡錄為「國立公文書館藏本」亦可；反之，若僅簡錄「內閣文庫藏本」，雖亦可知其典藏圖書館所在，然實非確稱定名。以本文使用的「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而言，確切的版本典藏來源之出處，當著錄為「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原內閣文庫本，江戶寫本，管志道萬曆34年序本，二卷，附錄三種」；或著錄「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原紅葉山文庫本，江戶寫本，管志道萬曆34年序本，二卷，附錄三種」。從目錄學角度，書目著錄之訊息自是愈詳盡愈佳；若必欲從簡，則簡錄時亦應作「國立公文書館藏本」，而非「內閣文庫

26) 位於東京的「國立公文書館」，與同樣位於東京的「東京都立公文書館」不同，是兩個單位，原內閣文庫藏書主要典藏在前者，屬於國立圖書館的資產。有關明治時期成立內閣文庫迄國立公文書館的沿革與組織變遷，可以參考吳密察、周曉雯、顏淑娟共同撰寫的《日本檔案管理體制及發展考察報告》，頁19-20，台北：國史館，2018年8月17日，共101頁。

藏本」。管志道此書原刊本為自撰萬曆34年序文之刊本，此係據管志道《重訂古本太學章句序》撰寫年在萬曆34年之故。然江戶寫本抄寫萬曆刊本的抄本時間卻必非此年，國立公文書館書目既著錄「江戶寫本」，便意謂抄本時間當在清初德川家康幕府成立以後，確切抄錄時間則不詳。

國立公文書館所藏原紅葉山文庫《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江戶寫本中，包含數部分：1)序文：管志道《重訂古本太學章句序》文末自署「大明萬曆丙午仲秋上浣甲辰婁江管志道序」。2)《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上、下兩卷。3)附錄：《辨石經大學錯簡》。4)《古本太學辨義》32條。5)附錄：《子思親承尼祖道統說》。國立公文書館藏本所錄共五種，與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朱彝尊《經義考》所錄，皆有出入；尤其是《略義》、《測義》、《石經大學章句輯注》三書，皆江戶寫本所未抄錄者。《略義》一書，《千頃堂書目》、《經義考》作「一卷」；《石經大學章句輯注》，《千頃堂書目》作「一卷」，《經義考》則錄「《輯注》一卷」，亦此寫本所無。

國立公文書館藏本未錄《測義》一書，此亦頗有可說。《經義考》與《千頃堂書目》均錄「《測義》三卷」，錢謙益《管公行狀》則記「《石經大學測義》三卷」。晚近2020年劉佩德、吳平主編《大學釋讀文獻集成》，收錄管志道《大學》著作三種刊出：《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古本大學辨義》、《石經大學測義》。²⁷⁾ 著作三種中，第一種前附管志道《重訂古本太學章句序》，序文時間與江戶寫本同：「大明萬曆丙午仲秋」，故知即是萬曆34年刊本；《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則章句合釋文分八章，不分卷，與江戶寫本區為上、下卷不同；末附《辨石經大學錯簡》。²⁸⁾ 第二種《古本

27) 見劉佩德、吳平主編，《大學釋讀文獻集成》，冊2，管志道《石經大學測義》，3卷，景印明萬曆34年刊本；冊3，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古本大學辨義》二種合刊，景印明萬曆34年刊本。揚州：廣陵書社，2020年10月，14冊。

28) 劉佩德、吳平主編，《大學釋讀文獻集成》，冊2，管志道《辨石經大學錯簡》，景印明萬曆34年刊本，《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之末附錄，頁32上-36下。

大學辨義》，共32條，後附《附子思親承尼組道統說》。²⁹⁾ 第三種即是《石經大學測義》，共分上、中、下三卷，前有管志道撰《石經古本大學測義引》。³⁰⁾ 由於此新編本所據，並未說明出原本典藏來源處，三書皆同，僅標註「景印明萬曆34年刊本」。然由此刊刻本，吾人已可確認錢謙益、黃虞稷、朱彝尊所錄「《測義》三卷」，皆是同一來源之刊布流傳，此即《大學釋讀文獻集成》中所收錄的《石經大學測義》萬曆34年本，且知此書初刻時便應即題作「《石經大學測義》」，如錢謙益所題云；而《經義考》、《千頃堂書目》則係簡題作「《測義》三卷」。據江戶寫本《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中所載管氏釋文，有云：

恐篇長而無段落，不便於讀者之尋繹耳，釋文又多沿朱子舊註而有註之所未盡者，則先有《測義》三卷，續有《或問辨義》三十二條。³¹⁾

據此，可知管氏係先有《石經大學測義》三卷，而後刪撰，成《古本太學辨義》或問32條；前者即是錢謙益、黃虞稷、朱彝尊及《大學釋讀文獻集成》所記、所題、所收之《石經大學測義》；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則未抄錄此書。可見江戶寫本之抄錄者係重視後者，即《古本太學辨義》32條。管志道於此書標題下自注：「仿朱子學、庸或問而作，凡三十二條。」³²⁾

29) 劉佩德、吳平主編，《大學釋讀文獻集成》，冊2，管志道《子思親承尼祖道統說》，景印明萬曆34年刊本，《古本大學辨義》附錄，頁28上-31下。

30) 劉佩德、吳平主編，《大學釋讀文獻集成》，冊2，管志道《石經古本大學測義引》，《石經大學測義》，卷前，頁1上-下。案，管志道《測義引》自題撰於萬曆34年之「春暮」，與《古本大學辨義》及《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自序所題撰於明萬曆34年之「仲秋」，仍有春、秋之早晚先後，故仍可推知《測義》三卷係先刊於該年之春，而《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與《古本大學辨義》則後刊於同年之仲秋。

31) 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卷上，管志道釋文，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江戶寫本。

32) 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附錄：《古本大學辨義》，東京：日本國立公

據今傳萬曆24年刊本《管子惕若齋集·續集》中，收有《錄大學刪存測義八條》，³³⁾ 此八條均自原三卷本《測義》刪除，並保留於《管子惕若齋集》中，這也解釋了為何國立公文書館藏本的原抄錄者未抄寫《測義》三卷、僅錄寫《辨義》三十二條之緣由。此亦可推論，當時應有《石經大學測義》三卷單刻本先行，後管氏不愜《測義》釐訂內容，故刪減後再刊《辨義》，共32條，即國立公文書館藏本中的《古本太學辨義》32條。至於《石經大學測義》確切的刊刻時間，《大學釋讀文獻集成》仍標註為「萬曆34年」，同於《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古本大學辨義》刊刻之年。此處則當有辨析。若據上文所考，則知三卷本《石經大學測義》不僅早出，同時也是管志道所撰有關豐坊傳世本《石經大學》的最早著作。管氏實已自言，此書刊成，猶在自訂改本《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之前。據《石經大學測義》卷前所附管志道《石經古本大學測義引》云：

當京口麟出之年，余有內艱，不預賓朋吉會，將先師耿恭簡公所貽《石經古本大學》一帙，合先友唐儀部仁卿呈過御覽者，殫精紬繹，有省，既為訂章句而註解之，復為作測義而敷演之。……編分上中下三卷，亦有累年問辨諸劄，與此測相發明者，間取附入其中。³⁴⁾

可知管志道得到豐坊的《石經大學》傳世文本，其時間當在其撰寫《引》、《序》的廿年前，即萬曆14年時，而其手中之豐坊《石經大學》文本的來源，則係得於其師耿天臺定向(1524-1596)；管志道又與當時奏上《石經大學》於朝廷的唐伯元(1540-1597)亦為學術交友，此為管氏自道撰著

文書館藏本，江戶寫本，管氏小字自注。

33) 管志道，《管子惕若齋集》，續集，卷二，頁20下~29上，萬曆24年序本，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本。

34) 劉佩德、吳平主編，《大學釋讀文獻集成》，冊2，《石經大學測義》，卷前，《石經古本大學測義引》，頁1上。

《石經大學測義》三卷的背景。又據其《石經古本大學測義引》文末自署「萬曆丙午春暮癸巳古婁管志道子登甫書於惕若齋中」云云,³⁵⁾ 則知《測義》之刊行, 在管氏《大學》改本諸書中, 確較它書為早; 諸書雖皆刊於萬曆34年, 然《測義引》云刊在此年「春暮」, 而《重訂古本太學章句序》則云刊在此年「仲秋」, 雖同年而暮春與仲秋不同, 適可為辨別刊刻時間先後始末之證。

國立公文書館藏本附錄中的《辨石經大學錯簡》, 則係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完成後, 同時人孫鑛文融(1543 - 1613)見之, 不以為然, 乃致書管志道辯論豐坊《魏石經大學》並無問題; 管氏針對孫文融來書而有此回應, 此回應文即寫本收錄的《辨石經大學錯簡》, 並附孫文融原文。

VI. 結論

總之, 國立公文書館所藏的江戶寫本, 其源出中土境內的萬曆34年刊本, 管氏重訂《大學》古本章句, 係受到正德13年王守仁刊刻《古本大學》影響, 故版本意識上的「重訂古本」, 即以漢代《禮記》本《大學》為核心來進行重訂還原, 《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其實便是管志道的當代改本。影響管志道重訂《大學》古本的另一重要來源, 則是嘉靖朝豐坊製作的《魏政和石經大學》思路特色。豐坊偽撰《魏石經大學》改本, 在正心章「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食而不知其味」下, 自增章文「顏淵問仁」共廿二字:

35) 劉佩德、吳平主編,《大學釋讀文獻集成》, 冊2,《石經大學測義》, 卷前,《石經古本大學測義引》, 頁1下。

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³⁶⁾

而後結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合釋文》的內容受豐坊改本影響，其於正心章中亦同豐本，增入「顏淵問仁」節，管志道並於《古本大學辨義》第23條中，鄭重申釋「顏淵問仁」節何以必增之故，其曰：

或問：正心章中唯賈本有「顏淵問仁」一段，而鄭本無之，安知其非偽筆？曰：吾所以深信賈本，大半為此一段，此章若無此段，則上下文不相貫矣。……即使偽者添入，吾亦以子思親筆信之。³⁷⁾

文中稱《禮記》本為「鄭本」，稱豐坊魏石經本為「賈本」。由此《辨義》問答自釋可知，管氏堅決相信豐坊石經本中的「顏淵問仁」節乃「子思親筆」，此亦可見豐坊改本對管氏重訂本思路的影響份量。抑又不止於此，江戶寫本附錄所收的管志道《子思親承尼祖道統說》，同樣亦是受到豐坊「子思經緯學庸」說之影響，管氏由此延伸造論，以為子思在其父孔鯨逝後，便由其祖孔子親為照顧並授學，故子思學問乃親承孔子，而非由曾子所傳。³⁸⁾ 其曰：「先儒每謂：顏子歿，唯留曾氏一人，傳斯道之統，因傳子思以及孟子。諒乎！余曰：此影響之論也。」³⁹⁾ 管說明顯係批評朱子的孔門道統論述。舊說以孔門傳述為「孔-曾-思-孟」之「四子」道統，管

36) 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卷上，正心章，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江戶寫本。

37) 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附錄：《古本大學辨義》，第23條，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江戶寫本。

38) 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附錄《子思親承尼祖道統說》，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江戶寫本。

39) 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附錄《子思親承尼祖道統說》，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江戶寫本。

志道則受豐坊影響，除「子思親承尼祖」新說外，並於《重訂古本大學章句》正心章增入「顏淵問仁」經文；凡此，皆見彼等反對朱子道統論述，並欲重構孔門道統的意圖。豐坊造說影響管氏，管氏造論又影響了崇禎時譚貞默(1590-1665)的《三經見聖編》，⁴⁰⁾ 此或者亦可視為一種道統論述的歷史變化，正於晚明逐漸興起。

투고일: 2023.09.14. 심사완료일: 2023.10.30. 게재확정일: 2023.11.27.

40) 譚貞默,《三經見聖編輯存》,二卷,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民國26年嘉興譚氏綠絲欄鈔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66冊。台北:莊嚴文化公司印行,1997年。又參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37,四書類存目,冊1,頁770,館臣提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增訂初版,五冊。

｜参考文献｜

- 王完(明)編,《丘陵學山》,天號,隆慶二年刊85卷本,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本。
- 王完(明)編,《百陵學山》,天號,明隆慶二年刊、萬曆12年重刊119卷本,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
- 王文祿(明),《大學古本問》,收在明王完編,《丘陵學山》,天號,隆慶二年刊85卷本,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本。
- 管志道(明),《管子惕若齋集》,萬曆24年序本,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本。
- 管志道(明),《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江戶寫本。
- 錢謙益(明)撰,錢曾箋注、錢仲聯點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黃宗羲(明),《明儒學案》,台北:里仁書局,《黃宗羲全集》,點校本,1987年。
- 劉斯原(明),《大學古今本通考》,明萬曆間刊本,12卷,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基金會印行,1976年。
- 毛奇齡(清),《大學證文》,文淵閣《四庫全書》珍本,九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76年。
- 謝濟世(清),《大學校議》,不分卷,朱絲欄鈔本,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本。
-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適園叢書本,台北:廣文書局印行,1967年。
- 朱彝尊,《經義考》,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年。
- 譚貞默(清),《三經見聖編輯存》,二卷,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民國26年嘉興譚氏綠絲欄鈔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66冊。台北:莊嚴文化公司印行,1997年。
-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增訂初版。
- 顧廷龍等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冊15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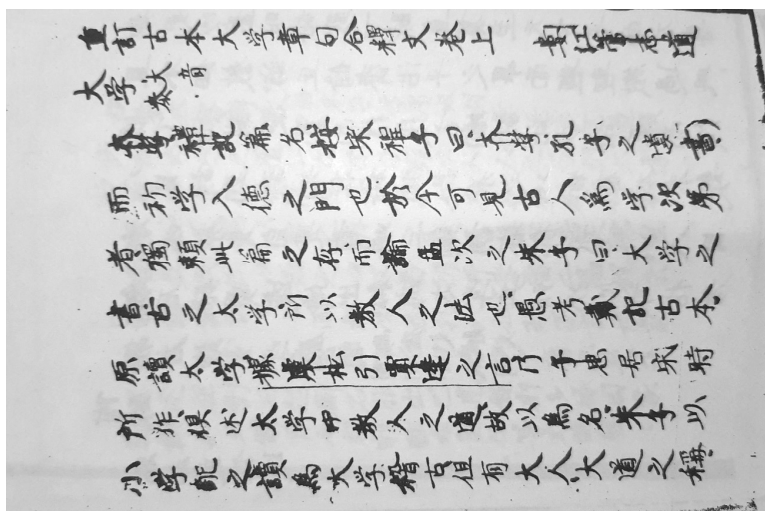
劉佩德、吳平主編,《大學釋讀文獻集成》,14冊。管志道《石經大學測義》,3卷,景印明萬曆34年刊本;冊3,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古本大學辨義》二種合刊,景印明萬曆34年刊本。揚州:廣陵書社,2020年。

吳密察、周曉雯、顏淑娟共同撰寫的《日本檔案管理體制及發展考察報告》,台北:國史館,2018年8月17日,101頁。

林泰輔(日),《四書現存書目》,日本大正三年排印本,收入嚴靈峰編,《書目類編》,冊99,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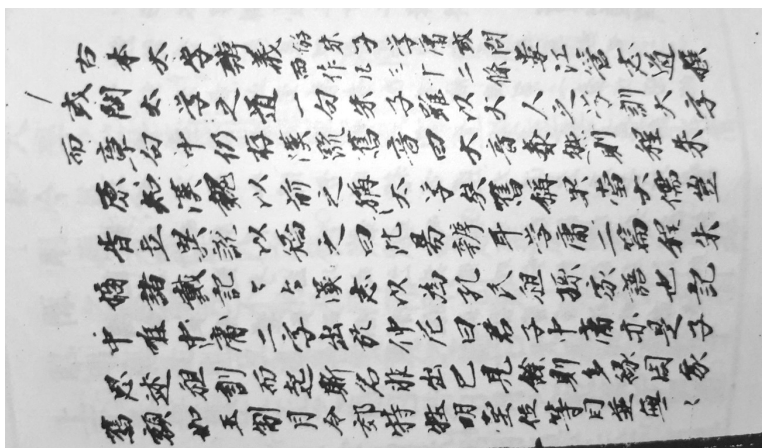
小野則秋(日),《日本文庫史》,京都:教育圖書株式會社,昭和17年(1942)。

附錄：書影



管志道《重訂古本大學章句合釋文》卷上，首頁。

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原紅葉山文庫本，江戶寫本，
管志道萬曆三十四年序本。



管志道《古本太學辨義》，或問第一條。

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原紅葉山文庫本，江戶寫本，
管志道萬曆三十四年序本。



管志道《子思親承尼組道統說》，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原紅葉山文庫本，
江戶寫本，管志道萬曆三十四年序本。